

## 第七章 在民主运动中奋起(1943-1949)

### 一、组建民联

陈铭枢虽然隐居山野，吟诗唱和，研究佛学，似乎忘情于山水之间，但事实上他并未就此不问世事，而仍时时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41年春皖南事变之后，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受到压制，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不得不离开重庆，政治空气沉闷滞重。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环境空前改善。但蒋介石、国民党不思趁此有利时机，努力奋起，反而感到松了一口气，造成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都日趋恶化。政治上，吏治腐败，贪污盛行；经济上，物价飞涨，生活艰难；军事上，消极避战，士气低落。这一切都引起了各界有识之士对大后方的时局、对抗战前途、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深切忧虑。

为了交流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1943年初，在重庆的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国民党民主派，酝酿搞一个时事座谈会，具体事宜由甘祠森、郭春涛等人出面进行。先是谭平山告诉甘祠森，准备搞一个时事座谈会，团结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中间分子，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甘祠森当即同意，并说很多人都有这个愿望。甘祠森找到郭春涛和许宝驹，谈起此事，他们都赞成，建议先由大家在一起谈谈，搞得好可以经常搞下去。甘祠森又和邓初民一道去找陈铭枢，陈表示支持，但认为自己“不宜公开露面”，只愿“当一个拥护者”。<sup>[1]</sup>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动向都在蒋介石的注目之中，公开露面有害无益。

甘祠森、郭春涛、许宝驹、高崇民4人确定了座谈会的具体事宜，原则是只谈时事，不谈其它；参加者以国民党上层人士为主，也可以吸收教育、工商界的上层人士，但不能让国民党顽固派和特务参加；参加者须政治上可靠，由基本成员带人参加，不采取自由参加方式；地点借用公司、银行、商号的房屋，以缩小目标，避免注意。甘祠森、郭春涛两人具体负责组织与联系工作，会议定名为民主同志座谈会。

民主同志座谈会的第一次会议是1943年2月在重庆举行的，参加者有邓初民、王昆仑、高崇民、郭春涛、张志让、李世璋、阎宝航、许宝驹、于振瀛、何公敢、孟宪章、陈先舟、胡守愚、甘祠森等14人。他们成为这个座谈会的基本成员，然后，再由他们发展新成员。先后出席者有100多人，其中有国民党民主派朱蕴山、余心清、王葆真、邓飞黄、范予遂、李世军等，也有社会上著名的民主人士马寅初、吴晗、张东荪、潘震亚、陈豹隐等。谭平山、陈铭枢、杨杰因目标较大，始终没有出席座谈会。但陈铭枢可以利用纪念“八，一三”抗战、为自己的孩子请客吃满月酒一类可以公开活动的机会，来和同志们联系。从1943年2月到1946年4月，座谈会坚持了3年多，一般每月举行一二次。大家在会上分析形势，交换看法，传递信息，提出中肯的意见。通过座谈会，大家对当前的局势与未来的发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成立打下了基础。由于组织得法，座谈会基本没有受到外界干扰。

从举办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谭平山、陈铭枢、杨杰便与甘祠森、郭春涛等保持经常联系，有时谭、陈两人还单独约人去谈。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大家都认为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不仅是参加座谈会的人有这个认识，这个创议也得到何香凝、李济深、冯玉祥、龙云、刘文辉等人的支持。在此之前，李济深就曾约谭平山、陈铭枢、徐谦等聚谈，提出改组行政院，撤换孔祥熙，成立抗战联合政府的想法。他们首先成立了一个筹备组，成员有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于振瀛、何公敢、甘祠森等10人，即通常所说的10人小组。实际上，10人当中的杨杰、朱蕴山、王昆仑3人经常不参加会议，而邓初民、高崇民、柳亚子、余心清、王葆真等人倒是热心的参加者。

1943年9月，筹备组借用一家公司的房子开了第一次会议。此后的聚会经常在陈铭枢家举行。陈铭枢在重庆城内曹家巷有一套两房一厅的住宅，地段幽静，门前冷落，适合用作聚会场所。谭平山住处离此不远，步行前来，很少缺席。由于与会者不事张扬，聚会没有受到过多的注意。陈铭枢受冷落多年，既为自避，亦为避人，现在好友相聚，他很高兴，在墙上挂诗云：

水远山长一草庐，八年陶醉是诗书；  
而今宾客常盈座，又有兴亡到老夫。<sup>[2]</sup>

筹备组聚谈的主题是成立民主派组织问题。首先讨论的是组织名称，大家取的名称都没有脱离国民党的范畴，如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会，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盟，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等。后来孙科一度表示可以秘密参加，但主张不用国民党的名字，不然蒋介石必定反对。最后大家决定，组织名称叫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

关于组织路线。有些人主张以上层人士为主，不仅影响大，且人少可保密。有些人主张以下层人士为主，可以从根本上改造党。双方后来达成共识，一般会员发展下层，基本干部发展上层，实际入会者还是上层人士居多。

关于政治主张。大家没有太大的分歧，都主张以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和国民党一大的宣言为纲，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反动。

关于活动方式。多数人主张暂时不宜公开反蒋，但应该参加公开的民主运动。以个人身份活动，组织公开，负责人不公开。

经过大半年的酝酿，民联从1944年上半年开始吸收会员。条件是政治倾向好，政治可靠，能够发挥政治作用。最初的发展是非常慎重的，入会者先由10人小组讨论，再由介绍人谈话，合格者即成为会员。为了稳妥可靠，民联会员没有小组和支部，也不履行书面手续入会，而是采用部分会员座谈会的方式联系，不宜公开者采取个别联系方式。这样，即便蒋介石发现此事，也可以蒙混过关。为了民联的建立，陈铭枢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是无声无息的幕后工作。

## 二、在战后民主运动中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赢得了胜利。但是，战后中国的局势仍然复杂万端，内战的阴影笼罩着中国大地。经历了八年抗战的磨练，陈铭枢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内战政策持批判态度。他更多更深地参与了战后民主政治运动，为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丽奔走奋斗。

战后初期，国内一度出现了国共和谈的宽松局面，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化成为可能。民联的活动也由半公开走向公开，并积极筹备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民联一大召开之前，首先由10人小组讨论了拟向大会提交的政治文件纲目，然后由邓初民、郭春涛、许宝驹、何公敢、甘祠森等起草，再由10人小组讨论定稿。这几个政治文件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政治主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决议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临时组织总章》。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鲜英宅举行。与会者20多人，代表了50多名会员。会议由谭平山主持，柳亚子、马寅初、陈铭枢、邓初民、高崇民、何公敢等在会上发言。谈到当时的形势，民联面临的任务，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会者慷慨陈词，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会中还有一个小插曲。陈铭枢发言时，有人从客厅的窗口看到鲜家老仆人正开大门，迎接邵力子和雷震进来。陈铭枢闻言大惊失色，拔脚便走，想从客厅的后门跑出去。郭春涛拉住他说：“不会到这屋子里来的。”鲜英一会来说：“邵、雷是来找张表老（张澜）的，不会到这间屋来，你们继续开会吧。”<sup>[3]</sup>陈铭枢知道蒋介石一直在盯着他，很注意避免给组织、别人和自己带来麻烦。从这一件事中，也可以了解他在1937年到1949年间，一直避免在政界公开露面的隐衷。

大会通过的政治主张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10大项73条，要求结束党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平等，实行普选，召开国大，制订宪法，首先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诸问题，实行地方自治，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平均地权，和平外交，军队国家化等。决议案包括党务改革、复员、保护侨胞、处理日本、惩办汉奸等项。在《关于党的改革方案决议案》中，要求重新树立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精神，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取消党内封建派系、特务机构，公平人事，改革党务。决议“号召党内民主进步的同志团结起来，改正党的错误路线，共谋恢复党的新生命”。<sup>[4]</sup>

大会选举了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17人，稍后推举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为常务干事，郭春涛为秘书处主任，许宝驹为组委会主任，柳亚子为宣委会主任。民联还聘请李济深、冯玉祥、孙科为指导员。

民联的成立，是国民党民主派适应新形势要求的举动。它的政治主张是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它的成立使国民党民主派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在推动国民党民主派参加民主政治运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民联成立初期，是以国民党民主改革派的面目出现的。它的活动主要是反对内战，促进国民党的改革。1946年1月26日，民联发表《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对政治协商会议所应讨论诸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要求“商定永息内争及军事问题之基本方案，确保决不再有内战之发生。”<sup>[5]</sup>4月25日，又发表《对时局意见》，主张在政协决议基础上解决纷争，“澄清时局，促成和平、统一、民主中国之实现。”<sup>[6]</sup>陈铭枢是这些主张的坚决拥护者，他在政协会议前后参加了不少会外活动，呼吁弭战息兵，实现和平、团结、统一，走民主的道路。他劝告蒋介石不应从私心或一党一派利益出发，而应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当蒋介石一意孤行，决定召开一党包办的“制宪国大”时，陈铭枢坚决拒绝参加。

民联领导人中一些人，包括陈铭枢在内，与孙科有老关系。他们曾想推动孙科领头，进行党务改革，改造国民党。为此，他们向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提出党务改革案。但是孙科本人并不愿意与蒋介石决裂，反而支持蒋的反共政策，二中全会充满反共反苏论调。民联因此联合四团体发表公开声明，反对二中全会违背“总理遗教、本党纲领以及当前人民意志”。

民联成立后，很快在全国10余个省市建立了组织，并发展到海外，先后出版过《民联》、《民潮》杂志。陈铭枢一直关注着组织的发展。1946年3月，陈济棠的侄儿陈树渠到重庆，陈铭枢利用老关系，与陈树渠接触，发展他参加民联。陈树渠后来担任民联粤港澳总分会主席（后又脱离民联），并在港筹办民联机关报《大同报》，后因经费不足，未能出版。

1946年4月，民联中央结束了在重庆的工作，转往南京、上海，民联成员也随着战后复员，多数转往东部省区活动。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政策，国共从6月开始爆发大规模冲突；民联所持立场也开始转向公开批判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从组织上与国民党决裂，与其他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共组新的政治党派。1947年2月，民联在上海召开第四次政治会议，会议政治报告认为，国民党自1927年以后就为反动分子窃据，“他们的主张愈来愈顽固，行动愈来愈腐化，手段也愈来愈毒辣”，但“忠实于三民主义的革命同志，是一直到今天在不断的、坚决的、公开的反对他们，和他们作无情的斗争”，“我们愿意和全国各党各派联合起来，站定人民的立场共同努力”。<sup>[7]</sup>在国民党眼中，此时民联的组织与行动无异为中共外围，对其成员除上层人物还暂予容忍外，其他人已成为追捕对象。“戡乱”动员令在7月实行后，民联转入地下活动，陈铭枢更少抛头露面。

1947年3月，李济深由上海到香港。9日发表《对时局意见》，公开表示抗战后中国不幸局面的根源，“就是违背孙总理遗教的中国反动派”，而蒋介石“竟成为反动派的领袖”，“应负主要责任”。从此，国民党民主派反蒋公开化，并开始酝酿成立新党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1946年4月，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李济深任主席。为了协调行动，1946年秋，民联、民促会决定成立南方联合执行部，仍由李济深任主

席。1947年5月，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在香港聚会，讨论成立一个共同的革命组织，以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共同斗争。因为在港的多为民促会的同志，李济深等认为应邀请民联的同志来港共商大计。李济深、何香凝遂联名致书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sup>[8]</sup>

李济深等人的想法与民联的计划是一致的。民联中央确定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争取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的统一组织，公开与蒋介石斗争。民联接到李济深的信后，先派柳亚子去香港，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朱学范等组成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委会，在香港开始筹备工作。在讨论党名时，大家都主张在名称中保留国民党三个字，何香凝并举出当年福建事变更改党名失败的教训，陈铭枢也同意。最后大家决定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

1947年11月12日，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开幕，尚未到港的陈铭枢当选为主席团成员。随后，谭平山、陈铭枢自上海到达香港，参加了第二次大会及会外协商。在酝酿主席人选时，谭平山、陈铭枢认为，宋庆龄在上海受到严密监视，没有行动自由，如果请她当主席有欠考虑。李济深、何香凝等遂改变原议，只请宋庆龄当名誉主席。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通过《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告本党同志书》、《组织大纲》等文件。《成立宣言》声明：“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政治上之罪恶，均为蒋介石一手造成”，“当前紧迫的革命任务，为推翻反对民主、破坏和平、媚外卖国的蒋介石之反动独裁统治，此不仅为本党一党之要求，亦为全国人民一致之要求”。民革“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并发布行动纲领，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sup>[9]</sup>会议选举李济深为主席，中央常委10人，民联的谭平山、郭春涛、何公敢、朱蕴山、邓初民等为中央常委。陈铭枢作为民联主要领导人之一，支持并积极促成了民革的建立，是民革的创始人之一，为民革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民革成立之后，陈铭枢回到上海，在十分复杂、危险的环境中从事第二条战线的秘密工作。

### 三、秘密策反

民革成立后，民联仍作为一个独立组织继续活动。民联中央确定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以沪宁为中心，从事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获取国民党军事情报，配合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这也是民革的工作重心之一。民革成立后，号召各地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单位，“揭竿而起，向人民靠拢”。其后连续发表《告国民党将士书》、《告海内外同胞书》、《告蒋管区本党同志书》，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立即行动起来，转变立场，举行起义，与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陈铭枢由于过去的经历以及与国民党军政

人员的广泛联系，在策反工作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还在1946年2月，李济深借到重庆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之机，邀集国民党民主派及西南实力派人士，在重庆聚兴诚银行楼上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民联领导人谭平山、陈铭枢、杨杰、郭春涛、朱蕴山、邓初民，西南实力派龙云、刘文辉，民主人士冯玉祥、张澜、熊克武、蒋光鼐等。会议主题一是讨论民主派的联合，并推出孙科与蒋介石抗衡。但参加了此次会议的孙科，会后又倒向蒋，此议未成，民联与孙的关系从此即疏远了。会议的另一主题就是反蒋。大家认为，“为了挽救危局，必须开展民主运动，组织团体，打倒民贼独夫蒋介石”，“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就在内战中去打倒他。”<sup>[10]</sup>会后组成了一个秘密策反小组，冯玉祥任组长，李济深、黄炎培、梁漱溟、刘文辉、龙云为组员，朱蕴山、陈铭枢、余心清、李一平负责联系各方，具体进行。冯玉祥准备出国时，6月又成立了第二个策反小组，李济深任组长，刘文辉、龙云、陈铭枢、余心清、朱蕴山、王葆真为组员。李济深负总的责任，北方由余心清负责，西南由龙云负责，朱蕴山在上海联络各方。陈铭枢由于地位特殊，只进行具体工作。

1946年7月，冯玉祥的旧部吴化文从济南来到南京，向冯玉祥请教今后的行动方针。冯玉祥介绍他与李济深联系，并对他说以后的行动可听李的指挥。李济深、陈铭枢、章伯钧都同吴化文见了面，动员他转变立场，站到人民方面。其后，陈铭枢、章伯钧又同吴化文专门谈了一次，告诉他今后联系的途径，鼓励他回部多做工作，早日投身革命。此后吴化文同民联、民革并通过他们与中共一直保持着联系。1948年9月19日，在济南战役的关键时刻，吴化文率九十六军3个旅2万余人起义，为济南解放做出了贡献，陈铭枢通过自己与吴化文的联系和交谈，也为此事尽了一份力。

1946年春，陈铭枢离开重庆回到南京，办了一个大士农场，用以维持生活，并作工作掩护，平时对外联系由身边的秘书等亲近人员进行。他所从事的秘密策反和情报工作充满了危险，他又一直是蒋介石注意的对象，使他不能不谨慎小心，公开场合很少见到他的身影。他就是在默默无闻之中，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着自己特殊的贡献。

有意思的是，1947年6月9日，在抗日战争期间倍受蒋介石冷落的陈铭枢被国民党政府授予上将军衔。这位虽然战功卓著，但早已手无一兵一卒的老将军，在内战激烈进行之际，获得了这个毫无价值的虚衔。这大概是陈铭枢在国民党方面得到的最后一个荣誉了。蒋介石出于什么目的和心态，给他一直提防的陈铭枢这样一个头衔，外人无从知晓，也许半是拉拢，半是警告，也许是堵堵世人的嘴而已，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总还想阻止陈铭枢与中共的合作。当然，曾经沧海难为水，这区区的虚誉，不可能对陈铭枢的反蒋活动产生什么影响，或许还使他多了点活动的掩护。此时的陈铭枢，对蒋介石、国民党都不再有任何幻想，国民党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时，陈铭枢就说：“这是蒋介石最后唱的一出热闹戏，是回光返照罢了。”<sup>[11]</sup>他已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人民革命的行列之中。

1948年3月，民革中央常委会第10次会议通过《军事工作大纲》，决定加紧军事策反工作的进行。会议授权李济深负责此项工作，组织实行机构。会后成立了第三个，也是民革正式成立后第一个秘密策反小组，成员有李济深、蔡廷锴、龙云、谭平山、杨杰、朱蕴山、王葆真等。朱蕴山向李济深建议，随着解放军在各战场的进展，如能策动华中战场国民党军起义，必将有力地配合解放军行动，促进解放战争早日胜利。他建议华中先设军事行动小组，他负责政治，王笑天负责军事，李一平负责财务，时机成熟时，再约陈铭枢出来负责。他的建议基本被采纳，此后的工作即按计划进行。李济深托佛教界著名的巨赞法师给在上海的陈铭枢带去一封密信，谈了今后的行动计划，得到陈铭枢的赞同与支持。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向南发展，已经逼近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地区。这一地区国民党统治严密，特务密布，耳目众多，秘密策反工作稍有不慎，即会影响地下工作人员和策反对象的安全，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为此，民联中央考虑到陈铭枢的安全和工作的需要，建议他隐蔽活动。陈铭枢遂以赴沪处理私人琐事之名，将大士农场委托罗海沙管理，自己悄然赴沪。以后又对外声称去香港，实际在上海隐居。陈铭枢在沪期间，隐居南昌路善庆坊20号前国民党驻北欧诸国公使诸昌年家中。他对外联系，经常通过秘书李家友，找申江医院院长刘之纲接头，与民联的联系，通过郭春涛、吴艺五进行；与中共的联系，通过郭春涛与上海局吴克坚进行。陈铭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临危不惧、机智沉着地从事危险的秘密策反工作。

1948年底，陈铭枢首先策动了陈仪起义。台湾省主席陈仪自台湾“二·二八事件”后被免职，闲居上海，目睹国民党腐化失败的现实，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对国民党已有离心倾向。1948年7月，他出任浙江省主席，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无法避免，考虑走另一条路，与中共合作，使人民生命财产少受损失。陈仪与好友胡允恭相见时，流露出此意，并谈到他与陈铭枢关系一直不错，但福建事变后便无往来，表示很想见见陈铭枢。胡允恭即将此意转达给陈铭枢，认为是个机会。胡允恭夫妇陪陈铭枢夫妇专程从上海去杭州，与陈仪相见。陈仪除了招待之外，专约陈铭枢一人共进晚餐，谈话内容外人一概不知。据陈铭枢后来告诉胡允恭，他和陈仪开门见山地谈到反蒋一事，陈仪说：“你们反蒋早，这条路走对了。”陈铭枢说：“你现在反蒋也不迟嘛！”陈仪再三问陈铭枢：“胡先生是不是共产党？能不能代表共产党？”陈铭枢说：“我想他应该是吧！”<sup>[12]</sup>酒酣兴至之时，陈铭枢书谭嗣同诗句赠予陈仪：“斗酒纵横天下事，名山风雨百年兴。”可以说，陈铭枢与陈仪的一席谈，对陈仪决心反蒋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李济深、朱蕴山也在做争取陈仪的工作，有密信给陈仪。陈仪决定反蒋之后，秘密从事准备活动，但他过于轻信汤恩伯，终至为汤所出卖。1949年2月17日，陈仪被免职，他在离开杭州去上海前还对胡允恭说，请他转请陈铭枢到上海家中叙谈。但陈仪21日到沪后，不及一周即被押往衢州，和陈铭枢再也没能见面。

1949年春，陈铭枢又进行了策动程潜起义的工作。上年冬，曾在中央银行工作的杨世骥调往湖南工作，行前去见了陈铭枢，陈铭枢请他带密信给湖南民政厅厅长邓飞黄，指

示在湖南建立民联组织问题。不久，邓飞黄、钱去非、杨世骥、唐耀晖等建立了湖南民联组织。1949年春，钱去非到上海向民联中央汇报工作，经常与陈铭枢见面，陈嘱咐他多与中共联系，按中共指示办事，并安排他与中共地下负责人吴克坚联系。陈铭枢对钱去非分析了形势，请他给湖南省主席程潜带去亲笔信，对程论述形势，晓以大义，劝他早日起义，弃暗投明。钱去非回长沙后，与邓飞黄等一同去见程潜，递交陈铭枢的信，并转达了陈铭枢当面交代的话。7月底，程潜决定起义前，亲笔给陈铭枢写了回信，对他表示感谢，明确表示将相机起义。<sup>[13]</sup>信由民联地下组织转给陈铭枢。

除此之外，陈铭枢还派人到安徽南部策动国民党第二纵队司令陈瑞河起义；与立法院的刘叔模、范予遂等谋划争取立法院长童冠贤；联系上海中央银行职员，保护金融财产；启发、指导一批青年大学生组成时代青年社，开展反破坏、反搬迁、护校护厂活动；让曾任军委会日本陆军密电研究组主任的霍实子拒绝为国防部侦译中共军事密码电报；派人去沪宁、沪杭线城市策反；并通过内线签发特别乘车证，以资掩护，等等。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迫于战争失败而带来的内外压力，黯然引退。但他并不甘心下野，仍在溪口幕后遥控一切。汤恩伯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企图倚靠长江天险，负隅顽抗。李宗仁上台后，派出张治中率团去北平与中共和谈，因国民党坚持划江而治方案，和谈破裂。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很快解放南京，逼近上海。就在胜利即将来临之际，国民党在上海进行着最后的顽抗，特务活动猖狂，全市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之中。

陈铭枢从事的工作，无论多么隐蔽，总会露出一些风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告诉陈铭枢，蒋介石下令逮捕他，如命令落到自己手中，自己可放过他，如命令落到军统手中，则自己不能保险。后来，陈大庆告诉他，命令已到自己手中，可保他平安。不几天，陈铭枢寓所周围出现了特务的身影。京沪铁路管理局局长陈伯庄，也向霍实子打听陈铭枢的去向，并对霍实子说：“他是那边（指中共）的人呀！”这个陈伯庄以前同陈铭枢见过面，并主张搞苏、浙、闽、粤、桂五省联防来抵御中共，陈铭枢告诫他：“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可救药的了，请你不必搞了。”此时为了安全起见，陈铭枢迁往沪西某处隐居。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陈铭枢仍然没有中止自己的秘密工作。有朋友劝他到香港暂避，他说：“我要留在国内为解放战争做一点事情。”<sup>[14]</sup>

5月24日，解放军的炮声在市区已清晰可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被拉出来担任代理市长。为了使上海尽可能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中共力争赵祖康弃暗投明，民联也认为陈铭枢可以对赵有所影响。陈的秘书李家友通过老同学，向赵转达了陈想与他见面的愿望。在解放军已经打到苏州河南时，李家友陪同陈铭枢冒着炮火危险往晤赵祖康，并进行了长谈。赵表示：“现在有中共和陈先生的关照，一定做到使上海市完整地移交于人民。”<sup>[15]</sup>此外，陈铭枢还做了许多工作，布置保护厂房、物资，并尽力规劝准备外逃者继续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1949年5月27日，陈铭枢终于在上海这座曾经对他充满着危险的城市迎来了人民的

解放。当天，他和郭春涛、吴艺五等人齐集家中，共庆胜利。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陈铭枢一直坚持在南京、上海从事民主运动与秘密工作。在大批民主人士不得不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或北上解放区，或南下香港之际，陈铭枢仍然在上海坚持从事地下工作，甘冒风险，不避矢石，为民主运动的发展，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

上海解放之后，陈铭枢欣喜之余，准备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一面料理结束手头的工作，一面准备前往北平，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与各方人士共商国家大计。正在此时，他又接受了一项现在回味无穷的任务，就是担任为美国与中共的接触搭桥的角色。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陈铭枢早就认识。1948年春，美国企图在中国扶植第三种势力，推动“自由主义”运动时，司徒雷登曾让他的秘书傅泾波与陈铭枢联系，希望陈能出面参加，为陈铭枢拒绝。这一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徐州战场陷入解放军重围，陈纳德准备重组飞虎队，为国民党军解围。陈铭枢得知此事，立即找中共吴克坚商议对策，决定由陈找司徒雷登设法阻止此事。陈铭枢找到司徒雷登，对他说：“中国大陆的事情，美国就不必再插手了，何况蒋介石已是强弩之末，国民党大势已去，已是无可救药的了，陈纳德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你司徒大使也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将来中美建交时，好做个搭桥人，我陈某到时，当会出来为你讲话的。”<sup>[16]</sup>司徒雷登听从了陈铭枢的意见，阻止了陈纳德的行动。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正奉命寻求与中共对话的司徒雷登听说陈铭枢将赴北平，便邀陈铭枢赴宁相见，托他在美国与中共之间传递信息。6月10日，陈铭枢到南京与司徒雷登长谈近4小时。司徒雷登请陈向中共转达美国的5点意见和4个文件，主旨是说明美国关切中共的政治、外交、经济政策，表达美国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希望，并强调与美国保持关系对中国有利。陈铭枢到北平后，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这些意见和文件。6月23日，陈铭枢通过罗海沙转告司徒雷登，说已跟毛泽东、周恩来顺利接触，谈话令人完全满意。同时，司徒雷登已向中共外事工作人员黄华提出了亲赴北平的意向，中共方面表示欢迎。但7月1日，美国当局否决了司徒雷登前往北平的请求。7月9日，陈铭枢回到南京，与司徒雷登又进行了一下午的长谈。第二天，陈铭枢根据到北平后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对毛泽东政治经济思想所作观察综合，整理成一个长篇备忘录，并两个附件，即中共对司徒雷登相关文件的答复，交给了司徒雷登。陈铭枢对司徒雷登解释说：中共对“国家立场”与“政治路线”是有所区别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有共同的立场而互相合作，但彼此的“发展路线”应允许有所不同。陈铭枢转述毛泽东的话说：“在政治上，必须严格；在经济上，可以互相迁就。”<sup>[17]</sup>中共的既定原则是要求美国和国民党断绝关系，停止援蒋。但美国此时没有决心与国民党断绝关系，与中共的立场相距甚远。陈铭枢的奔走没有结果。次年春，陈铭枢堂侄赴美时，陈还托他给司徒雷登带去一封亲笔信，提到“眼前中美建交为时尚早”。<sup>[18]</sup>

## 注释

[1][3] 甘祠森：《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2][10][13][15] 《陈铭枢纪念文集》第14页；22页；22页。

[4][5][7][9] 《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页；35页；93-97页；117-123页。

[6] 《新华日报》1946年4月26日。

[8] 《革命文物》1980年第1期。

[10] 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41、75页。

[11][14][16][18] 霍实子：《我所知道陈铭枢的若干事》，《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

[12] 胡允恭：《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革命史资料》第16辑。

[17] 牛大勇：《陈铭枢为美国与中共对话奔走》，《团结报》1989年7月11日。